

夜臺長伴貝多芬

秦夢羣

——從王光祈的一生看其對近代教育思想的影響

「山之崖，海之涓，與我少年中國短別離；
短別離，長相憶！
願我青春之中華，永無老大之一日！
唯我少年，努力努力！」

王光祈：去國辭·寫於民國九年

光緒十七年，王光祈生於四川溫江縣。祖父

王光祈是中國近代史上，一個頗富傳奇性色彩的人物。他的為人所知，不僅在其發起的「少年中國學會」，就是在音樂教育思想方面也是赫赫有名的。王光祈在「少中」時代致力於政治思想的改造，給予當時社會極大的影響。民國九年去國赴德進修，竟挑選當時國內無人問津的「音樂」研究，不但介紹西洋樂理，對於國樂的推動發展也是不遺餘力。至民國二十五年客死異鄉，十數年間未曾返國，這在當時人眼中是相當不解的。但即使如此，王光祈在近代社會文化改革上却有其不朽的地位。眾人對於「少中」一段的歷史知之頗多，但却鮮詳其音樂教育思想。本文以其一生做為分段，敘述其幼年求學經過，創辦「少年中國學會」時期，及赴歐倡導音樂教育的過程，就中探討其在近代中國教育思想史上的影響。

一、少年求學時期（光緒十七）

（民七年）

由於家境貧寒，王光祈自幼都是由其母親親自教讀，到了九歲時，才進本地的私塾。在此期間，生活相當清苦，除了一個鍋廠每年可收二萬多文的租外，其餘的開支就靠老母做些針線度日，這種情形一直到其十二歲時才有所改善。當時四川總督趙爾巽，是其祖父的受業弟子，為感報師恩，就幫助王光祈到成都來讀書，並且給他報捐了一個同知同程，在財務上給予支持，所以在十三歲時，王光祈就進入成都胡雨嵐創辦的第一小學就讀。第二年，也就是光緒三十四年，再考進成都高等學堂分設中學的丙班，因而結識了李劫人、周太玄、曾琦、郭沫若諸人（註一），至民國元年底畢業。

民國三年春，王光祈出川。夏，考入北京中

國大學專門部法律本科就讀。其時接觸西洋思想，在看法上已頗有所見。據其同鄉好友郭有守回憶說：「五四時代流行的口號是解放、奮鬥、創造，……若愚（王光祈字）一向要拿雙拳打出一個天下，在北京時曾入中國大學讀書，同時替成都某報作通訊，以所入作學費，他可算勤工儉學的前輩。他平日自強不息的精神很令人佩服！」（註二）

由以上這段話中，我們可以得知王光祈在北京的求學生涯是極苦的，但也在此環境中，孕育了以後成立「少中」的理想。周太玄先生後來回憶道：「光祈的理想，得他們的商榷，漸行具體。後來夢九慕韓也都到京，我們常在南池子愚生宅，和中央公園等處聚談。光祈和慕韓的見解漸趨一致，承認了慕韓眉生夢九等的少年中國主義，自己犧牲了若干左傾過激的主張，確定了達到自己的理想的路子。於是便由他寫成了一本吾黨今後進行意見書，這即不啻是學會的先聲……。」（註三）慕韓就是後來青年黨創始人曾琦先生。他與王光祈是中學同學，兩人皆抱有「少年復興中國」的理想，思各以其所學，改造社會，終成為後來青年運動的偉大先鋒。

在這段啟蒙時代裏，還有一事也是值得我們

注意的：那就是雖然王光祈在京接觸法律政治，漸漸成爲「理性」的倡導者。但實質上，在他的血液中，依舊是富有浪漫色彩的。生爲詩人之孫，孕涵於天府之國。王光祈的詩才也令人刮目相看，從所存留下來的作品及其以後翻譯的各國國歌，在在顯示其對文學的深嗜篤好，這與其後學習音樂必是有所關連的。因爲「詩歌與音樂本來關係甚密，光祈在少年時代對於文學已經有了深厚的修養，其由政治法律一變而改攻音樂，與其認爲奇怪，毋寧視爲當然。」（註四）

民國七年六月，王光祈自中國大學畢業。七月就籌備發起「少年中國學會」。那時國內秩序頗不平靜。歐戰未息，軍閥又假借參戰之名，大舉向外借款進行互鬥爭鬥。在此擾亂的歲月中，「少中」的興起是極具意義的。它象徵當時青年的改革思潮，希望以正義之舌、春秋之筆來復興民族，振興國家。「少中」的活動宛如衝天煙火般的五光十色，而主要推動它的就是「少中」時代的王光祈。

二、「少中」時代（民七、民九年）

「光祈和少中之所以有這樣的關係，實在因爲他要借這個學會來實現他的理想。簡直可以說他的整個人生觀都是寄托在這個學會。我常說光祈沒有這個會，便無生趣，這個學會若沒有王光祈，便沒有靈魂……」（註五）

以上這段話是少中的另一活躍份子周太玄先生所說的。正如所描述，王光祈在這段時間中能發揮自己的抱負。將一腔熱情，完全施於「少

中」的會務上，希望以少數青年的結合奮鬥，共謀國家民族的強盛復興。他在起草的少年中國宣言書中主張：「同人等欲集合全國有爲的青年，從事專門學術，獻身社會事業，轉移末世風俗。……知改革社會之難而不可以徒托空言也，故首之以奮鬥繼之以實踐；知養成實力之需，時而不可以無術也，故持之以堅忍，而終之以儉樸。務使全國青年志士，皆具先民敦厚之風，常懷改革社會之志，循序以進，懸的以趨。勿爲無意識之犧牲，宜作有秩序之奮鬥。」（註六）由此並產生了後來「少中」的八字信條——奮鬥、實踐、堅忍、儉樸。

「少中」從民七年發起後，影響當世後代極大。推其學學大者，即在產生後來的青年黨及共產黨，所以研究政黨史的，無不能不對「少中」加以研究。但除此之外，「少中」對當時的教育也有不小的影響。當時推動者主要爲王光祈，大抵可分以下三方面探討之：

一爲自由學術的思想。此在教育過程中極爲重要。尤其大學的課程中，必須要有「吾愛吾師，吾更愛真理」的精神，如此才能迸出智慧火花。王光祈對其極爲堅持：「我們從前主張思想自由，反對武斷。近聞有人以往日之受諸人者，反而變本加厲施諸後輩青年。不論其所主張者爲任何主義，而揚言祇有我的主義可以救國，其他均當排斥，不許別人懷疑，不讓別人批評，那我到死都是反對的！……我不信世間有超人，小之一國，大之世界，決不容許「思想包辦」！一個民族有無希望，就看後輩青年是否進步。應該鼓

勵他們，豈可欺騙他們？天下萬惡無有過於蒙蔽青年人的思想。……將來回國應做的事很多，「誓死擁護思想自由」乃是我現已確定的方針之一……」（註七）所以在「少中」組織中，就成立有各種學會，研究各種學問學說。當時學會中並非有一強有刀的領導者存在。這與後來「少中」的分裂多少有些關連。但即使在最後關頭，王光祈尚堅持：「總之學會是『社會活動』的團體，不能開除政治活動意見不同之會員。」其擁護自由學術之心可想而知。表面看來，此思想與教育無甚相關，但其實影響甚大，此對後來的「五四」及大學的自由研究風氣，都是直接間接發生催化作用的。

影響教育的第二方面在於「復興民族文化」運動的推行。王光祈在民國十三年印行的「少年中國運動」序言中提到，少年中國運動只是一種「中華民族復興運動」。方法有兩種，一爲民族文化復興運動，一爲民族生活改造運動。前者要提倡禮樂的「感情教育」。後者實行方法，王光祈認爲：「現在我們中國人的日常生活，真是簡陋枯燥得很！持與歐人豐富愉快的生活比較，未免相形見絀。我們推究其原因，不外二種：一爲無識，二爲無業。因爲無識的人太多之故，群居終日，言不及義，不知什麼叫做人生……，要醫治這兩種病症，只有普及教育與發展實業兩法。」（註八）

根據上述主張，所以「少中」積極推行「收回教育權」運動，及發行各項刊物及叢書，以使那些「無識」的人得到知識的滋潤。「收回教育

權」主張，在使那些由外國教會所設立的學校，在教學上不能違背以中國民族文化所定的教育宗旨，不排斥異端，不妨害講學與學術自由。簡言之，就是要維護中國民族文化。這與當時蔡元培先生的「教育獨立議」遙相呼應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。（註九）

在發行刊物及叢書方面，最重要的即是「少年中國月刊」的出版。創刊號在八年七月十五日出現，是一種綜合性刊物。多次以專號的情況出現，探討刊登人文、自然、社會科學的論著與譯文。如一卷四期的「婦女號」，一卷十一期的「新唯實主義」，二卷八期、十一期、三卷一期的「宗教問題號」，皆對各問題進行了極深遠的影響。宗教問題專號，並還邀請多人講演，國外著名學者如杜威、羅素皆曾參與，給予當時思想界莫大的影響。（註十）

除了「少年中國月刊」外，「少中」後來也出版了「少年世界月刊」及「星期日週刊」。前者多刊登應用科學如工農方面的文章。後者則是成都分會所出的刊物。對於當時貧瘠的思想界，注入了許多刺激。另外「少中」叢書的出版也貢獻很大。從民十年到十五年，共出了三十三種，內容天文地理無所不包。像余家菊、李璜所寫的「國家主義的教育」、王光祈的「少年中國運動」、田漢譯的「莎樂美」等，給予當時知識界許多思想教育的機會。它的影響據舒新城先生後來回憶說：「在許多刊物之中，少年中國最爲我所注意；因爲其中的文章多注重討論實際問題，正與那時所謂『多談問題，少談主義』的少年心情

相合。而少年中國中，我又最同情於光祈兄的主張。」（註十一）與舒先生有同等心境的人必不在少數。「少中」刊物的主要推動者王光祈使當時學生接受了理性的洗禮，他從事教育事業、出版事業、新聞事業。提倡「創造的、社會的、科學的」生活，使思想革新教育終由空談而進於實踐。

在教育上的第三方面影響，就在成立了「工讀互助團」。王光祈出身窮苦，向來以半工半讀爲生。爲使貧寒子弟也能讀書，即仿效蔡元培李石岑的勤學儉讀社，成立了「工讀互助團」。成立未久，即有數百人參加，規定入團者每日工作需四小時，所得悉數歸公，其平常學業所需，則由團內供給。後來雖因「分子漸趨複雜，管理既不易，經費又困難。」終而最後失敗。但「他組織這互助團的動機，是很純潔的，完全是想爲窮苦青年解決讀書問題……」（註十二）「工讀互助團」的成立雖僅曇花一現。但其與後來晏陽初在河北定縣的平民教育班，在精神上是相互溝通的。王光祈以杜甫「安得廣廈千萬間」的胸襟，使近代平民普及教育向前邁進了一步。

以上所談的，是王光祈在「少中」時代的教育思想與影響。平心而論，倡導之功較大，確實實踐的時間卻只有兩年。民國九年四月，王光祈整裝赴歐，至其逝世前都在德國渡過。在這段去國的日子中，他作了對近代教育上的最大貢獻——對於音樂教育的倡導與主張。

三、德國的飄泊生涯（民九—二十五年）

一九二〇年王光祈離國赴歐，開始其研究音樂的生涯。他在覆友人黃仲蘇信上說：「近於政治經濟諸科，擬暫舍棄，將專攻音樂，雖明知其繁復，不易有功，願邇來心境頗惡，非此不足以怡悅性靈，培植熱情。」（註十三）當時國內專研音樂者寥寥可數。王光祈在德國進修數十年，初至時絲毫不懂德語，但憑其努力奮發，最後竟能翻譯中西，實在是相當不容易。他在德國的生活情況，由於山岳大海相隔，國人鮮有詳知者。據當時德國波恩大學的許米德博士（Prof. Dr. Erich Schmitt）後來回憶說：「一九二〇年，王君來柏林任申報通信記者。二年之後，他自己發現對於音樂有特殊興趣，可以作爲他今後一生事業的目標。起初在柏林一個音樂專科學校中研究，一九二七年乃正式入柏林大學習音樂學，竟於一九三四年在本大學音樂系中戴上了博士的榮冠。他的論文題是：中國古代歌劇（自一五三〇年至一八六〇年）……他努力介紹西洋音樂的精華到中國去，並且應用西洋的方法去整理那至今還未有人碰過的材料；在這一方面，他可以算是第一個前驅者。他寫了許多中文音樂書籍，最著名的如：對譜音樂、各國國歌詳述、翻譯琴譜之研究。從音樂家的立場，他寫了一本中國詩詞曲之輕重律。此外他又寫了一部中國音樂史，以及許多關於歐洲音樂的著作……」（註十四）

王光祈的改習音樂及日後的倡導音樂教育思想，都是有其崇高的目的。簡而言之可以四字括之，那就是希望達到「音樂與國」的境界。其目睹當時國人對於音樂的輕視，故起而倡導。整理

中國固有之音樂及介紹西洋音樂，以期能振奮人心，恢復民族的精神。他說：「我嘗因此深思苦索中國人的性格，詳考細察西洋人的習俗，最後乃恍然大悟，中華民族的『民族文化』，便是中國古代的『禮樂』。由這種『禮樂』以養成中華民族的根柢思想。……樂也者，小而言之，則為涵養性靈之具；大而言之，則為協和萬方之用。我們中國人生息於孔子學說之下者數千年，而孔子學說又實以禮樂二事為其基礎。所以中華民族的根柢思想，與我們古代禮樂有至深密切的關係。我們的古禮古樂，誠然有許多不適用於今的地方，而且簡陋的很；但是古人立禮製樂的本意，則千古不磨。我們現在宜利用西洋科學方法，把他整理出來，用以喚起我們中華民族的根柢思想，完成我們的民族文化復興運動。」（註十五）

由以上這段話中可知，王光祈希望能以音樂涵詠人心，以達到「情感教育」的目的。所以積十餘年精力，致力於東西兩洋樂史的研究。他在晚年所出的「中國音樂史」的自序中，詳述他的宏願及理想：

「至於吾人之所以毅然從事樂史研究者，在此嘗有下列兩種理由：（一）吾國音樂進化，除律呂一事外，殆難與西洋音樂進化同日而語。但吾人既相信音樂作品與其他文學一樣，須建築於民族性之上，不能強以西樂代庖，則吾人對於國樂產生之道，勢不能不特別努力。而最能促成國樂產生者，殆莫過於整理中國樂史。蓋國內雖有富於音樂天才之人，雖有曾受西樂教育之士；但是若無本國音樂材料以作彼輩觀摩探討之用，則

至多只能造成一位西洋音樂家而已……倘吾國音樂史料有相當整理，則國內音樂同志，便可運用其天才，用其技術（製譜技術）以創造偉大國樂，儕於國際樂界而無愧……（二）國人飽受物質主義影響，多以自然科學為中國唯一需要之品。而不知自然科學，只能於吾人理智方面，有所裨益；只能於吾國生產方面，有所促進；而不能使吾民族精神為之團結。因民族精神一事，非片面的理智發達，或片面的物質美滿，所能相助者；必須基於民族感情之文學藝術，或基於情智各半的哲學思想，為之先導方可。尤其是先民文化遺產，最足引起民族自覺之心。音樂史亦先民文化遺產之一也，其於陶鑄民族獨立思想之功，固勝於一般痛哭流涕，狂呼救國之快郵代電也。」（註十六）

保存「先民文化遺產」，引起「民族自覺」之心，陶鑄「民族獨立思想」。這是王光祈秉承「少中」時代而來的理想。所更進深的，乃是其確立「音樂教育」的價值，及其來作為達到復興民族的手段。他在著作「東西樂制之研究」自序中的一段話中最能表達此種理想：

「昔少年意大利之興也。實由該國之人。既聞詩人但丁之歌。復觀古都羅馬之美。乃油然而生其建國之念。此無他。意大利人能自覺其為意大利民族之故也。著者不揣愚昧。以為吾黨若欲創造少年中國。亦惟有先使中國人能自覺其為中華民族之一途。欲使中國人能自覺其為中華民族。則宜以音樂為前導。何則？蓋中華民族者，係以音樂立國之民族也。現在中國人雖已墮落昏憤。

不知音樂為何物。然中國人之血管中，固尚有先民以音樂為性命之遺痕也。吾將登崑崙之巔。吹黃鐘之律。使中國人固有之音樂血液。從新沸騰。吾將使吾日夜夢想之少年中國。燦然湧現於吾人之前。因此之故。慨然有志於中國音樂之業。蓋亦猶昔日少年意大利黨人之歌、但丁之詩。壯羅馬之美而已。」（註十七）

由以上觀之，王光祈不啻為中國音樂教育的先頭部隊。其最大的貢獻除有倡導之功外，對於音樂教育教材的編著上也是居功甚偉的。其著譯作品，在音樂教育上重要者計有數十種之多，例如「西洋音樂與詩歌」、「西洋音樂與戲劇」、「歐洲音樂進化論」、「中國音樂史」、「東方民族之音樂」、「翻譯琴譜之研究」、「西洋製譜學提要」、「東西樂制之研究」、「西洋樂器提要」及「音學」等。不但有系統的介紹西洋樂理及音樂家，在國樂的整理工夫上更是極為出色。其所著的「中國音樂史」，完全是以進化觀點及科學方法完成的。其從「律」、「調」的發展開始，介紹中國古代的黃鐘乃至崑曲的沿革。然後再介紹中國古代的樂器，並旁及樂隊、舞樂、歌劇的探討。追本溯源一氣呵成，成為首部有系統的音樂著作，給予近代音樂教育極大的影響。尤有進者，王光祈尚以比較的觀點分析東西兩洋的音樂，「東西樂制的研究」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作品。就中探討樂調、樂譜及樂制的不同。說明「我們中國之律與調非如一般妄人所謂一錢不值之物也。」另外如「音學」的出版，詳述西洋近代音樂的樂理，更是使中國人首次學習到「西洋

豆芽菜」的重要作品。

當時國內歷代所存留下來的有關音樂書籍，鮮少有完整而富系統的。雖然名之為「樂志」，其實內容卻掛羊頭賣狗肉，所載的完全不是那一回事。王光祈對此曾加以評論說：「我們知道：中國二十四史之內，多有律歷志禮樂志諸篇之列入，常將天文時令政治風俗，混在一起，講得不亦樂乎。而獨對於當時重要樂譜，卻不附入一二。其實只是樂譜，尚嫌不夠；因為當時唱奏之人，往往於正譜之外，尚自由加入一些特別尚腔或手法進去……。因此之故，我們中國古代音樂，遂完全喪失，只餘下一些紙上空談……。」（註十八）造成此種後果的原因，多半歸於社會對音樂的輕視。「只是為學之士，不願深求，乃致落伍，良可歎也。昔李安溪記顧亭林之言曰：『吾於經史，略能記誦，都是零碎工夫，至律歷禮樂，整片稽考，便不耐心。』亭林賢者，尚說此種懶話，其餘俗儒，更可知矣。坐是之故，吾國音樂乃大落他人之後……。」（註十九）

面對如此貧瘠的園地，王光祈卻毫無「便不耐心」之意。遊德十數年，無時不在著作與翻譯，將系統的中西音樂知識介紹進來。他是富有理想大志的：「吾儕今日丁茲中國古代文化復興之際，不將此責雙肩負起，更讓誰人去負？吾甚願同志，將『便不耐心』四字，懸為大戒，則無論求學作事，終必有所成就也。」（註二十）職是之故，在異國寂寞的圖書館中，王光祈宵旰終日，完成了數十部音樂作品。就教育的觀點來說，這些譯作都是上佳的教材。

說這些作品是上佳的教材不是沒有道理的。

大凡一部成功教材的編著，必須具有史學方法及科學方法。衡理來論，王光祈的作品皆能兩者並兼。即以其中史學方法一項來說，梁任公曾標舉四項原則：史德、史學、史識、史才作為治史的原則。就此而論，王光祈的著作雖不致已達完美境界，但也能成十之八九。就任公最重視的史德而言，「音樂興國」的理想，使王光祈不但「心術端正」，而且不做誇大、附會、武斷之言。必須要嚴加確知資料來源後，才能納入文中。所以他在寫中國音樂史時，一開始就說：「鄭觀文君之中國音樂史，材料亦甚宏富，可惜多未註明出處，是以不敢盡量採用。」（註二十一）審慎程度之深，由此可見。

在史學方面，任公要求不但要有專門學問，而且還要講點普通常識。譬如你編音樂史，就要先有音樂方面的專業知識。王光祈在國外期間，終日浸淫中西音樂史料，著作之時取材極為豐富：「……十之七八，係余個人心得。其餘材料則取之於國內時賢著作者十分之一；取之於國外西儒著作者，亦十分之一……。」（註二十二）在普通與音樂有關的知識方面，王光祈也列出各種有關學術，認為「必加以研究，否則不能貫一融通。」內容包括有「美學、物理學、生理學、心理學、美術史……等。」（註二十三）就此而言，無論在專門知識與普通知識方面，王光祈都是具有相當基礎的。

再以史識史才兩項論之。史識即是敏銳的觀察力，由其中一點現象，探究其中的奧妙。在西

洋音樂史綱要下卷中，王光祈其以地域因素分析

「維也納三傑」的音樂：「海登（即海頓）及摩擦耳提（即莫札特）兩氏，均係奧人；其作品皆帶『南方人士』活潑詼諧性質，極優美愉快之能事。反之，白堤火粉（即貝多芬）則係德人，來自北方；性既孤冷，命尤坎坷；……又值其時法蘭西大革命潮流洶湧，悲觀主義盛行一時；於是彼之作品，亦復飽含嚴肅沈痛之音，常以『人道主義』為其歸宿；並以『群眾為其作品對象，不復再如海登及摩擦耳提兩氏之僅以少數『賞音之士』為其作品對象也。」（註二十四）分析評斷三人異同，觀察力何等銳利。再就史才——編史技術而言，所著皆能從古至今，分門別類，使脈絡清晰分明，無論中國或西洋樂制之闡述，皆能使讀者大有所獲。

在科學方法方面，歷來講求「大膽的假設、小心的求證。」此種原則在王光祈著作中比比可見。例如他對劉向所著世本一書中，所載之庖羲作五十絃一事加以考證，發現「世界各種樂器之進化，實以絲絃樂器為最晚；因其材料及組織，皆較其他敲擊或吹奏樂器為複雜故也，換言之，斷非黃帝以前律管尚未發明之時所能有。」因是推斷「世本此種記載，斷不能引為根據。」（註二十五）即以此例，可看出其實具有科學考證之精神，絕無主觀附會的情況出現。其他諸如利用物理儀器，研究黃鐘律管的顫動數，在某些著作後各章中列有問題練習，符合教育心理學的「反饋」原則等，都證明其有充分的科學精神。王光祈的研究音樂原意，在於能「以音樂復興民族」

，但以其具有史學及科學精神的譯著，卻附帶為國內音樂教育，留下了許多「信達雅」的教材。

王光祈專攻音樂的主要目的，已如前述，在於能要以「音樂再造民族」。他秉承國家主義的思想，認為要救國家必須要喚醒民族精神。所以一方面整理國樂，使國人不但窺其廟堂，而且能恢復民族自信心。一方面介紹西洋音樂，製作愛國詩歌。例如其翻譯各國國歌用意即在振奮民心。其中一首芬蘭國歌為：「吾族往日血戰，佛瓦平原，波蘭沙岸；來清郊前，魯村山畔。芬蘭之力猶未變，尙能殺得敵人紅血沙場濺。……」音韻有力，擲地有聲，不知激勵了多少國人心腸。使在外敵屢犯，國土板蕩的情況下，中華民族猶能生存。就此而論，王光祈真如義大利革命中之但丁詩歌一般，以詩人及音樂家的氣質，去策勵勇士，安慰流亡，真正達到了「音樂興國」的境界。

王光祈嘗自謂：「能創製作品者，不必具有整理史料之學力；能整理史料者，又不必具有創造天才也。而余個人終身學業，則只能以整理史料一事自勵。至於實際創造國樂，則有待來者。」（註二十六）因是之故，王光祈並未成爲一位創作家，生平作曲極少。又因爲躊躇國外，至民國二十五年逝世前未曾返國，所以對音樂教育的學校建立、課程安排上無所貢獻。但即使如此，王光祈對於近代音樂教育卻有其不可磨滅的地位。我們與其說他是一位音樂教育的實行家，不如說他是音樂教育的倡導者。其最大的影響在於「音樂興國」的理想，及有系統的著譯音樂教材。

由於他的倡導，使音樂從以往的「無用之學」而能編入教育課程，並且成爲振奮民心的利器。他的音樂教育思想與民初提倡「美育」的蔡元培先生是很相近的。在光祈先生逝世後，蔡氏在南京的追悼會中，曾發表悼詞，頗能確立王光祈在音樂教育上的地位，他說：「……留德的同學，研究音樂的卻不多。我所認識的，止有王光祈先生與蕭友梅先生。蕭先生注重音樂的技術，而以學校爲傳播的機關；所以回國後即在北京大學及師範大學等校設音樂研究會，後來在上海辦理音樂專科學校；無論有何等艱難與辛苦，他終鏗而不舍；現在音專的建築與設備漸漸擴展；將來必有遠大的進步。王先生注重史實，而以著作爲傳播的工具，他的著作已經發表十餘種：如西洋製譜學提要，歐洲音樂進化論等，是介紹西洋音樂於中國的。如德文的中國古代之歌劇（博士論文），是介紹中國音樂於德國的。如東西樂制之研究，是比較中外的。照此三方面進行，對於音樂界的貢獻，真難以限量。」（註二十七）

在中國音樂史自序中，王光祈曾說：「現在一般國內人士，既無享受相當音樂教育之機會，同時，其他各種學術；而音樂一物，更爲國人所視爲未技小道……」王光祈若不留連國外，定對國內音樂教育提供更多的機會，如創辦學校及親自培養學生等。但其介紹倡導之功卻不因此而被抹殺，他的後來習音樂數十年的生涯，可以國立音樂專科學校所送的一幅輓聯來描寫之：「曠代仰宗師，著述等身，壽世更留音樂史。窮年攻律呂，棲遲異地，夜臺長伴貝多芬。」

四、結語

以上所談的，即是王光祈在不同時期對教育的影響。他生於寒門，早年做過牧童。求學期間始終半工半讀自力更生。赴德後更是生活困苦。他曾對朋友魏嗣鑾說：「十年以來，余成樂書，已十餘種，其餘以糊口而譯著者，亦十餘種；當余執筆時，腦軛作痛，余以左手撫頭，右手作字，至痛楚無力時，工作始廢；世或有譏余譯著不精者，使其知余之生活爲何似，將亦不忍苛責也。」（註二十八）但即使如此困難，王光祈卻依舊秉持理想，在生涯最後十數年間，挑選冷門科目音樂選修，其毅力實令人敬佩。

「少中」的理想得自意大利革命的「少年意大利黨」。它起於紛亂之時，卻發揮了萬丈光芒。孟壽椿先生說：「五四運動的前後，中國青年們的求知慾是很強度的。世界的新智識新學說都無限制的盡量輸入中國。出版物風起雲湧般的出現。然其最早而最有名的月刊，除開新青年新潮以外，就算少年中國與少年世界兩種月刊了。這兩種月刊的材料，雖由學會會員供給，但經理與編輯大部分的責任，都爲光祈先生所獨力擔負……」（註二十九）由此來看，王光祈不愧爲當時少中的靈魂，給予當時思想界極大的衝擊。「少中」最有活力的時期也在民七到民九年間。當時許多主張如平民教育、復興中華文化、學術思想自由的教育立場，也多是由王光祈所提出的。在音樂教育方面，王光祈秉持「音樂興國」的理想。「慨然有志於中國音樂之業。蓋亦猶昔

日少年意大利黨人之歌、但丁之詩，壯羅馬之美而已。」盼望喚起國人熱情，以成興國大業。這個夢想雖然至今仍未達到，但他卻是有系統有組織，整理並介紹中西音樂史料的人，使中國近代的音樂教育步上正軌。瞻望過去數十年，王光祈實是此方面重要的奠基者之一。

王光祈的性格，正如李璜先生所描述的：「一面是嚴肅而整飭，一面卻又柔曼而和諧，他這短短的一生，尤其是我們所知道他的這二十年，其前後的演變，正好比一首音節剛健而辭藻淒麗的詩。」（註三十）他的一生，實在富有傳奇的色彩。幼年的牧童、少年的思想先鋒、中年的音樂家，交織成這個理想主義信奉者的數十年歲月。雖然葬身於異國的古城波恩，但是他對近代教育的影響卻遍及國內。王光祈的生命之歌，正如其所希望的，早已徜徉於黃河之畔、崑崙之巔。

附註：

- 註一：左舜生等、王光祈先生紀念冊（台北、文海出版社中國史料叢刊一八八、民二十五年）頁六。
- 註二：同前註、頁二七、郭有守所寫「若愚在蓬廬」。
- 註三：同前註、頁二一、周太玄所寫「王光祈先生與少年中國學會」。
- 註四：同前註、頁八。
- 註五：同前註、頁十九。
- 註六：王光祈、少年中國宣言書。
- 註七：黃仲蘇、王光祈與少年中國學會、頁

十一。

- 註八：王光祈、少年中國運動，民十三年。
- 註九：郭正昭、王光祈與少年中國學會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二期、民六十年）。
- 註十：秦賢次、少年中國學會始末記、傳記文學第三十五卷第一期。
- 註十一：同註一，頁四十二。
- 註十二：同註一，頁六十一。
- 註十三：同註一，頁五十七。
- 註十四：同註一，頁一〇二。
- 註十五：同註八。
- 註十六：王光祈、中國音樂史上冊（上海、中華書局、民二十五年）頁二。
- 註十七：王光祈、東西樂制之研究（上海、中華書局、民十三年）頁九。
- 註十八：同註十六，頁四。
- 註十九：王光祈、西洋製譜學提要（上海、中華書局、民十八年）自序頁八。
- 註二十：同前註。
- 註二十一：同註十六，頁一。
- 註二十二：同前註。
- 註二十三：王光祈、西洋音樂史綱要上卷（上海、中華書局、民十九年）頁十一
- 註二十四：王光祈、西洋音樂史綱要下卷（上海、中華書局、民十九年）頁一二九。
- 註二十五：同註十六，頁六。
- 註二十六：同註十六，頁三。

- 註二十七：同註一，頁一〇八。
- 註二十八：同前註，頁三十八。
- 註二十九：同前註，頁六十。
- 註三十：同前註，頁三。

書名：唐代政治史論集

（66年7月出版）

作者：王壽南

定價：四九元五角

斷代論史，甚不容易，至於選題專論，更費思慮。本論集共收三篇論文，「唐代文官任用制度之研究」、「唐玄宗時代的政風」、「論晚唐裘甫之亂」，俱作者心力之作，尤其裘甫之亂、自小觀大、無論史識、史論，均見功力。斷代論史，本書有其特定價值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